



和宗教政策的结果。

为进一步加强新疆各民族的大团结,促进新疆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每一位干部和群众,必须正确地认识新疆的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这不仅是一个文化素养问题,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问题,也是我们讲政治的重要体现。实践已经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我们考察和正确认识新疆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惟一科学的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观察新疆的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我们应该在以下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观点和认识:第一,民族和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因而,无产阶级执政党都理应正确地看待和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第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生活聚居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并存的地区,中外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点。第三,自秦汉以来,新疆与中原地区就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138年汉朝统一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开始,尽管新疆历史风云变幻,历经多次政权更迭,迄近代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也一直试图肢解新疆,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是,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从未改变过。新疆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国内外敌对势力

历史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正确阐明新疆





南、北两大封闭盆地形成 ,从而构成今日新疆的基本地貌轮廓 ,即通称的“三山夹两盆”。所谓“三山”指新疆境内从北到南排列分布的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诸山系 ;“两盆”是指分别夹在三座山脉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在三山夹两盆的西端 ,矗立着高耸入云的帕米尔高原 ,它如同一条彩带 ,蜿蜒曲折地由北至南呈斜状将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诸山系联结在一起。这一地理地貌特点对新疆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别具一格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面高山环绕 ,大体上使新疆形成一个天然的封闭地理单元。除了阿尔泰山之西的准噶尔盆地以西有山地缺口 ,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冷湿气流多少可以进入这里 ,从而带来水汽形成降雨 ,气候较为湿润外 ,大部分地域则因为高山相隔 ,来自海洋的东亚季风、西南季风等湿润气流很难到达这里 ,从而使新疆成为我国最为特殊的内陆干旱区。不过 ,与没有高山、冰川和绿洲的非洲撒哈拉沙漠或澳洲的荒漠地带截然不同是 新疆诸群山巍岭中分布的星罗棋布的冰川河流常年不断地注入两大盆地 ,进而在干旱荒漠中形成了生机盎然的片片绿洲和草原 ,给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 ,从而使该地区成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

在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内部 ,巍峨的天山从东到西横亘在新疆中部 ,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



地分列南北两端,这一地貌特点则导致了新疆南、北疆气候的显著差异,北疆年降水比南疆丰富许多,而南疆冬季则比北疆暖和。这种特殊的地理因素所构成的自然环境不只形成历史上北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南疆则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构成两地区居民迥然相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境内南、北以及西面皆山脉环绕,惟东部无高山相阻,有坦途同中原地区相通,这一地形特点使新疆同外界的交往联系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着天然的东倾性。它对于密切新疆同内地之间的关系,保障秦汉以后新疆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人类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因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旷原沙海,高山透岭以及极度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给新疆的社会发展无疑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但是同时又给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各族人民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形式多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宝库增光添彩。总之,在认识和探索新疆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则尤其不能忽视新疆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这一显要特点。正是在这些自然环境以及所导致的人文特殊条件的作用下,才演绎了新疆诸多丰富多彩、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篇章。



摇摇远古时期的新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区。新疆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人类的历史是从利用石头开始的,所以,考古学上将人类最初的历史称作“石器时代”。毛泽东同志一首诗中所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的标志,大致是指距今二百万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它又分为旧、中、新三个时期。近代新疆各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新疆已经发现距离现在一百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址,例如在塔什库尔干河岸东岸、民丰县、和田市以及吐鲁番交河故城等地,应该说,这些遗址的发现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人们是新疆最早的居民之一。这里的人们当时使用着一种看似很笨重的打制石器,并且已经知道用火。如果说这些旧石器遗物不是很规范,还需要更多的新的出土文物进一步加以论证,那么,一些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的发现则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远古时期新疆各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状况。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多年的中、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七角井和三道岭,罗布泊西岸,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

且末、于田、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当时人们使用一种在原来笨重粗糙的打制石器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石片、石核,学术界称为“细石器”,其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罗布泊地区的人们为了得到石器工具,甚至不惜行走数百里到远处的山地中采集加工,考古工作者在阿尔金山中曾发现了制作石器的工场。人们还发现,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出土的远古时代遗物的石器型制、磨制技术以及共存的彩陶色彩、图案风格与我国华北地区以及甘肃、宁夏等地相近,而与西方各地出土文物迥然有别。这不仅否定了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而且清晰地显示了新疆史前人类最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与祖国内地的相似性,以及存在着的一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

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以前就是联系东、西方关系的交通孔道,这不仅使新疆历史上民族迁徙和交往活动十分频繁,而且还使该地区居民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楼兰故城以及附近地区发现数具古人干尸,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距今约有**猿猴**年的所谓“楼兰美女”。在东疆的哈密地区也出土了一些年代略晚于楼兰古尸的干尸。在位处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一个名叫香宝宝的地方,人们也发现了一批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葬式分土葬和火葬两种。而在北疆地区的伊



的建立



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墓葬品中,有一尊栩栩如生的跪姿武士像尤为引人注目,只见武士头戴尖状高帽,帽顶呈钩状,上身裸露,腰下系短裙,赤脚,高鼻大眼,大鬓角。这显然是该地区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物肖像,其形象与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发现的古尸有一定区别。据人种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对天山南北各地出土的古代人头骨的体质形态特点和人种系统的测量分析及科学研究显示:新疆古代居民既有欧洲人种特征,也有蒙古人种特征,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点。欧洲人种分布的位置靠近新疆西部,但是不断地向东移动;而蒙古人种分布位置主要靠近东部地区,他们有逐渐向西迁徙活动的趋向。新疆地区作为蒙古人种同欧洲人种相互交汇的地带已是一个不疑事实。又据汉代文献记载,曾同周人有血缘关系的羌人也是塔里木盆地早期的居民。除此之外,已知这一时期先后迁入新疆的北方民族还有大夏人、莎车人等。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明确无误地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人种和民族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明”。

根据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等史料记载以及考古资料分析,大致在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地区逐步完成了从原始社



没有过由某一部族或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所谓地方政权组织。

摇摇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形式的单一性,决定了它必然积极发展与周邻地区,特别是同中原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顺应东西方各地人们彼此间联系交往的要求而出现的“丝绸之路”,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一部分路段就途经新疆境内。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有“赛里斯”的传闻,“赛里斯”是“丝”的音译,后来变成当时人们对于传输丝绸到西方的中国人的称呼,说明华夏先民的步履早已进入新疆,新疆各地同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交往联系。新疆境内的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的墓葬里曾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相同物品也为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部地区巴泽雷克古墓随葬品中发现。新疆哈密七角井细石器文化遗址以及罗布泊地区的古墓葬中还发现了用海贝类制作的装饰物,如珊瑚珠等,此类物品显然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我国先秦古籍里,诸如《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中都有关于古代新疆地理、山川、河流的记载,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原人民对于新疆已经有所认识和了解。在商王武丁之妻的墓中,人们发现了用新疆



摇摇汉朝“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和意义

今天的新疆范围,在汉代时被称为“西域”。其含义是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西汉时期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后,到清末为“新疆”一名所替代,一直沿用了近 190 年。“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内地对于天山南北的认识以及汉朝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关系。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是自西汉以来天山南北各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汉朝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当时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度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最初比较弱小,曾依附于东胡,后冒顿单(音缠 鞮鞮)于(匈奴最高首领)继承父亲王位,势力逐渐强大,公元前 209 年,冒顿单于创立匈奴奴隶主政权。周邻各族皆归其所属。不久,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迫使大月氏人西迁到今天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塞人则慑于大月氏人的军事压力,向西南迁徙到帕米尔高原地带。匈奴人占领河西诸地,大月氏人的西迁使西域诸地由此归属匈奴治下。后来为了加强对西域各族的统治,匈奴西边日逐王在焉耆设置了“僮仆都尉”专理该地事



使客观上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各地民族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意思就是原来不通,经过努力,现在通畅了。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不久,公元前107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一举措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氏(音底凿)、羌诸部之间的联系,使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联系更为便利。公元前103年,张骞受命再度西行,同此前不久迁往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联系结盟事项。经过多方努力,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汉朝同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2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1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大宛(今费尔干纳)。这些政治军事活动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犂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该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屯田之举到汉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在天山南北诸